

## 深读·红色传奇



1945年7月,延安已被视为中国未来希望之处。

68岁的黄炎培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: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,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,一地方,乃至一国,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……”

毛泽东自信地回答: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,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从延安到西柏坡,再从西柏坡到北京,中国共产党最终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。从“打天下”到进京治理国家,就像毛泽东所说的——“走,我们赶考去!”

而今天,我们可以说,这场“考试”已经有了答案。

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之十一



◀ 1949年,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。  
(资料片)

## 一直在路上

本报记者 任鹏

● 结束语

90年,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路上。

自晚清以来,浩瀚广阔的历史长河中,弹指一挥的百年间,已达成未曾有过的巨变。

从封闭愚昧的封建王朝,到自由开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维持数千年的传统社会,无比迅猛地向着现代社会转身。

在纷繁巨变的巨大背景下,变革中的中国,一直在追寻自己那条道路。像一条不会失去方向的永不逆流的河。

这条已经走过而且正在探索的道路,应是如此——

需要一种深沉的力量,爱这个国家,更爱她的人民。爱这些国民的正直、善良、醇厚、默默付出,甚至他们曾遭受的苦楚。满足每个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享受温暖的幸福、安心生存的保障。

需要一种绝对的公平,当人们仰望星空,追随探索的只有那无穷的真理、严肃的法制与凛然的正义。民主政治文明之下,坚持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社会价值。透明与公正的规则,应该成为最基本的信仰。

需要一种理性的声音,融汇于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的交响曲中。已经解放思想的“改革”脚步,在浪漫的梦想中踮得更坚实而稳健,从而改变整个中国。而我们会为每一步进步而高兴不已。

在这个变动的时代,没有人能够忽视,也无法忽视这些探索中的道路。因为方向很清晰,从不虚妄。

未来,中国共产党的“赶考”之旅还将继续。前路漫漫,惠特曼的诗句犹在耳边:“不论你望得有多远,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边;无论你能数多久,仍然有无限的时间数不清。”



▲ 1949年4月下旬,毛泽东在香山别墅看解放南京的捷报。(资料片)

# 走,我们进京赶考去

本报记者 任鹏

## 与重庆相比宛如另一世界

1944年秋天,美国记者冈瑟斯坦贸然闯进了延安一间朴素的小会议室。

14个人正围着延安市长热烈地讨论。这14个人中有农民、商人、老者、共产党员,还有村姑和一个小报编辑。

在这场市参议会的行政与立法委员联席会议上,身份各异的14名市参议员,由延安人民选举产生。

市长详细解释准备实施的“十小纲领”,并声称每一条都要和人民仔细讨论,使大家了解其意义和实现方法。

参议员们先后发言。商人指出政府有责任让商人知道何处设新店最妥;老学者批评小学教室太挤,教师的书法不够好……

冈瑟斯坦后来知道,市长根据议员的意见,对施政纲领做了修改。

这是延安实施的“三三制”民主制度的一部分。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组成中,共产党人只约占三分之一,其余由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。

冈瑟斯坦评价共产党“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,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,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,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”。

早在1936年9月,陕甘宁边区就成了民主尝试的一块试验田。

“通过民主普选制,参议会制、‘三三制’等制度,构建人民参政议政的平台。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、1941年和1946年举行三次民主选举,选民比例最高达到82.5%。”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吕连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,鉴于农民大都不识字,没法画票选举,于是边区创造了许多贴近实际的方法。

“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票法,识字不多的用画圈法、画杠法,完全不识字的用投豆法。”

一粒豆代表一张选票,被选举人背后各放一只碗,底部放棉花,以防投豆时被候选人听到声响;碗上盖一张纸并用烟头烫出小眼,防止碗中豆的多少诱导后面选民的投豆倾向。

到1944年10月,抗日民主根

据地人口增至9000万,都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,没有任何敲诈、勒索,官员们廉洁奉公。

红色政权对以“国民素质低”为借口而奉行独裁的国民党给予了有力回击。

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声称共产党“普选”是作秀。理由无非是“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,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的那一大一小官吏的名了”。

《新华日报》立刻撰文予以辩论。“选举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,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”,“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,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”。

在访问延安的美国军人谢伟思眼里,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,路无乞丐,男女平等,整个地区如一校园,青春活泼,民主模范,自修,自觉,自评,与重庆相比宛如另一世界。

就在这轻轻如春风的发展中,中共从延安走进西柏坡。

## “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”

“晚上,毛主席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,站在窗前,眺望着柏坡岭的夜空,一支一支抽起烟来。”如今,在西柏坡纪念馆,这几句话是讲解员熟记的解说词。

62年前的1949年3月22日晚上,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,他难以入睡。

从1947年3月被迫放弃延安,中共中央转移到了西柏坡这个太行山里的小山村,如今已过去两年时间。

这个“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”,见证了三大战役胜利、土地改革、七届二中全会,以及筹备新的政协会议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。

1949年的冬天,在偶有积雪的山间小路上,毛泽东常常边散步边思考。

“五年推翻蒋军”的胜利比想象中来得要快,这时的国民党,已成强弩之末。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。

毛泽东没有考虑“能不能胜利”的问题,他曾经和俄语翻译师哲谈起“敢不敢胜利”的问题。

师哲不明白:既然能胜利,

为什么不敢胜利呢?

毛泽东解释说:长期在农村打游击,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?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?我们这么大的国家,这么多人口,要吃,要穿,面临着这么多问题,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?

在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,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,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,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。

在当时的西柏坡,由于大批国民党士兵被改编,解放军内部少有人出现了打骂群众和地方干部等错误行为。高度警惕的刘少奇说:“一个村长,一个县委书记,就可以称王称霸。胜利后,一定会有人腐化、官僚化。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,加强思想教育,就会好一些。”

在七届二中全会上,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:胜利面前,务必继续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;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

会场上,最初悬挂的是马、恩、列、斯和毛泽东、朱德的画像,毛泽东一进场便提出批评: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,这样不好。

根据毛泽东的提议,最后一天的大会通过了“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”等6条决议。其余五条是:不给党的领导祝寿;不送礼;少敬酒;少拍掌;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、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等。

这是毛泽东给各级领导及党员定下的,也是给自己的要求。

临进北平时,毛泽东又告诫中直机关各部委办,希望大家做好准备。

“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,是思想准备……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,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。”

## “我们要考及格,不要退回来”

1949年3月,中共中央工委书记苏培良收到了办公厅印发的“进京守则”。

苏培良和同事们被要求不准进入人家,不准随便进入戏院、电影院等公共场所;不许贪污浪费,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,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。

西柏坡会议结束后,中共中央就开始准备迁往北平的工作。中央机关各单位、解放军各部都进行了入城教育,学习城市的有

关知识,制定入城后的守则。

每个人配发一套美国毛巾、布军装,背包,新鞋和一条毛巾,以及两桶美国制造的牛肉土豆罐头等准备在路上用。

新成立的“转移委员会”负责中央动身时及动身后的组织和善后,留守人员把房屋家具全部登记造册,交给当地政府统一处理。出发前,借的物品要奉还,水缸担满水,把室内院子打扫干净才能出发。

苏培良和留守的同事成立检查组,分头到各村检查,凡有损坏的门窗家具物品,马啃了树皮的都要作价赔偿。借住的房屋有倒塌的漏雨的都要修缮,直到房东满意为止。

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。

1949年3月23日一早,100辆美国制造的十轮大卡车、十几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西柏坡。200名司机是挑选出来的,政治思想好、技术熟练。

前一天晚上熬夜工作的毛泽东仍然精神焕发,他高兴地说:“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。”

周恩来则风趣地说:“我们都应当及格,不要退回来。”

“退回来就失败了。我们决不做李自成。”毛泽东满怀信心。

3月24日中午,毛泽东一行到了保定。饭后,负责保卫的人请示是否要静街。因为街上有人认出了毛泽东,满街都是等着看毛主席一眼的人。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赞成静街驱赶群众的做法。

“不要静街,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,更不能影响商店开门营业,主要是把街上的交通秩序维持好。”周恩来说。

当晚,毛泽东接受进驻北平的具体工作汇报,谈到入城仪式时说:“入城仪式要搞,但不要兴师动众,规模要缩小,要减少浪费。”

次日下午,北平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满怀热情地迎接自己的领袖。

当晚,中共五大领导人宴请了李济深、沈钧儒等二十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,表达了中共愿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合作的态度与诚意。

在回香山驻地的路上,毛泽东兴奋地说:“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但这还不是完全的胜利。今天还不能开大的庆祝会,等全国都解放了,再开大的庆祝会,意义就更大了。”